

中原学研究 with 历史区域分析法

◇ 陈隆文

摘要:建构中原学的学科体系必须引入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其中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尤不可忽视。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区域,以历史区域分析方法比较中原及周边区域的历史价值是中原学研究不能回避的理论问题。与周边其他区域相比,中原地区在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发展与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发挥过核心作用,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

关键词:中原;历史区域分析法;核心区

一、问题的提出:中原学建构需要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早在2005年,李庚香先生就提出了“文化形象再造”“建设文化河南”等发展河南文化的新思路。经过长期的思考与酝酿,2016年,李先生在《打造“中原学”一流学科,奋力建设思想河南》一文中正式提出建设“中原学”的构想,指出:要提升河南的文化软实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加快河南现代化建设进程,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构建“中原学”、打造思想河南^[1]。在谈到构建“中原学”的意义时,李先生特别强调:构建“中原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其有助于振兴河南文化、重塑河南形象,也有利于提炼出新时代的“中原文化精神”、引领未来河南经济社会建设的潮流。如何建设“中原学”?李先生对“中原学”的空间范围、研究内容和研究群体及目标作了明确的规定,指出:“中原学”在地域上主要以河南为中心、兼顾广义上的中原地区,内容以“中原文化”为对象;研究主体包括河南乃至全国所有的中原文化研究学者,并将这些分散在各个学科内的学者整合成为一个以“中原学”为统领的研究群体,形成“中原学”研究的高端团队;而建设“中原学”不仅仅是继承和发扬中原优秀传统文化,更主要的是以创造现代中国文化为指向,凝练中原文化精神,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引领中原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最终建设一个具有“中原特色、时代风貌”的“中原学”^[1]。在这里,李先生特别指出了构建“中原学”的地域范围、研究内容、研究主体和学科追求及其特色。李先生还强调指出:在中原学的构建过程中,要将各个学科中研究中原文化的学者整合成为一个以“中原学”研究为纽带的研究群体,“中原学”研究之所以要整合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共同参与,这与“中原学”研究涉及较为宽广的领域密切相关。“中原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分为古(古代传统文化)、今(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人(人物)、文(文献典籍)四类,涉及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学科领域,这必然要求我们加紧融合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新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建设支撑“中原学”发展的综合学科体系^[1]。这项工作对于推进未来中原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2017年,张新斌先生在详尽阐释了中原学研究基本概念的前提下,又对中原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做出了高度概括,他认为中原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要重点研究中原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主要是解决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问题;另一方面将新时代中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作为关注点,主要是助力中原崛起与振兴河南的现实问题。中原(河南)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集中体现,如何保持其经济社会快速、可持续地发展,真正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有哪些,丰厚的文化资源怎样才能得到深入挖掘

与弘扬,提升庞大的人力资源素质的途径是什么,优越的区位条件向振兴河南强大助推力转化的突破口在哪里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在全国都具有典型的示范效应^[2]。从张先生概括的中原学的主要内容来看,中原学研究不仅需要具有历史、考古、哲学、文学等学科背景的学者的积极参与,而且其研究对象由于还涉及当前和未来中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因此还迫切地需要引入除历史、考古、哲学、文学以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学科理论,这样才能够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中原学。可以说,只有把中原学研究纳入现有的科学的学科体系之中,并在此发展方向下引入多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才能够深入探索中原学的学科架构,丰富、完善中原学的学科体系。因此,无论是构建中原学的现实需要抑或中原学研究本身的内容规定,都迫切需要引入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实现中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构建“中原学”与当代河南经济社会发展之间良性的互惠体系。

二、地理学的核心:区域地理学与区域分析法

地理学以人类生产生活所处的地理环境为主要研究对象,区域性是其显著的学科特点之一。地理学的这种区域性特征,即指不同区域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之间的差异,导致某一地理要素在此地呈现出的规律在彼地并不完全适用,故而在区域地理研究中不仅要剖析不同区域内部结构(各种成分之间、各部分之间)的差异和各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区域系统中的作用,而且还要研究不同区域之间彼此的联系,以及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制约关系。在地理学区域性研究中,区域的内部结构与不同区域之间的关系是两个重要的方面。要将这两个方面有机统一于同一个研究过程中。很多学者都将区域地理研究视为“地理学的核心”^[3]。区域地理学不仅是地理学的重要分支之一,而且还要求必须对特定区域进行实地考察,并借鉴地理学各分支学科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成果,通过对区域内各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以此来揭示区域自身的特点、区域之间的差异和联系。区域地理研究伴随着整个地理学的发展而发展,甚至可以说地理学就是在区域地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4]。中国古代区域地理学以对区域的文字描述为主,《禹贡》《管子·地员》《山海经》《元和郡县图志》和历代正史中的《地理志》《河渠志》《食货志》等都可以视为区域地理学的著作。

近代地理学是第一次产业革命的产物,并伴随着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先后到来而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地理学。近代地理学的形成以A.洪堡《宇宙》和C.李特尔《地学通论》两部地理著作作为重要标志,洪堡和李特尔二人都对区域学研究的近代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1799年到1804年间,洪堡前往拉丁美洲进行了实地考察,之后撰写出《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三十卷)一书,这是首部以拉丁美洲为研究对象的区域地理著作。在这部书中洪堡运用比较方法综合研究了当地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区域特征。而李特尔提出了区域的概念和区域差异的观点,认为人地关系存在统一性或一致性,但却寓于地理多样性之中,这也引出了地理学中的系统地理学(即部门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两个基本分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二人都非常重视区域地理的研究,但洪堡关注的是系统自然地理学,而李特尔则侧重于区域人文地理。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随着地理学科的分化,区域地理学受到更多的重视,越来越多学者从事区域地理的研究。在法国,P.白兰士等地理学家进行了区域地理研究,撰写出了《世界地理》等著作;而德国地理学家A.赫特纳所做的区域分异研究,认为区域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结合;美国学者R.哈特向继承了赫特纳的观点,他在《地理学的性质》与《地理学性质的透视》两部书中指出: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层的地域分异特征的学科,系统地理学是其起点,区域地理学则是它的终点。在当时,区域地理研究盛行,产生了许多研究区域地理的著作,涉及全球绝大多数地区^[5]。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地理学也不断进步,兴起了一场呼唤学科创新、重构研究理论框架、引入计量方法、重视总结规律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地理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从分析区域的地理差异转移到了研究区域空间系统与空间联系上来,他们借鉴数学研究中以模型为

基础的逻辑演绎法,通过对地理景观进行定量分析,来揭示其空间秩序及内在的规律性。在地理学的“计量革命”中,地理学家在研究中概括出一些区域地理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心地概念、重力模式、扩散理论和区域鉴别等一系列的理论学说,从而使更加系统和精确的专题性的区域研究日益成为地理学研究的主流^[5]。在区域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中,不同的研究观念与研究方法层出不穷,但可概括为两个层次:

1.传统的文字描述与阐释

传统的文字描述与阐释在中国古代区域地理学中有悠久的历史。作为中国最早以“地理”命名的地理著作,《汉书·地理志》以叙述西汉末疆域政区设置情况为主,依据各地的不同特点,分别记录当地的山川形势、水利设施建设、官营工矿生产、重要关塞位置、著名的祠庙、历史古迹等的分布情况。据统计,其中载录有盐官36处、铁官48处,反映出当时官营盐、铁生产的分布与规模;记有水道和陂、泽、湖、池等300余处,对所记水道则多在发源地所在县条中详述其源头和流向,对较大河流还附记其所纳支流及其行经里程长短。历代其他正史的《地理志》中也都有相似的记载,这些数据为我们了解古今河道的变迁情况,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历史依据^[3]。作为世界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A.洪堡和李特尔都对区域地理学中区域特征文字描述与阐释的方法作过论述。他们都认为:地理学是描述、研究存在于地球表面特定时空中的事物或事件的,区域是地理学研究最基本的范畴,它的目标是实现关于区域地理现象的感性认识上升到对地理规律的理性归纳。

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两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和赫特纳又对地理学的基本任务进一步作了更为具体的阐发和发展。李希霍芬将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目标界定为:明确区域内不同地理景观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赫特纳则认为:地理学的基本任务是辨认区域之间的差异,主要方法是区域之间的相互比较,借此来突出区域空间的独特性。他还提出了一个描述区域地理特征的所谓“区域地理样板”(scheme of chorology),这个“样板”主要包括区域的地理位置、地质地貌、气候、植被、自然资源、开发过程、人口分布、经济结构、交通条件和行政区划等方面,研究主要是采用实证主义的证实法和区域地志式的综合表述方式^[5]。迄今为止,文字描述的传统方法仍是区域地理学研究最重要的分析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的核心价值在于:文字描述是把经过分析和综合后的区域主要特征和主要联系呈现给读者的必要手段。在“记述”过程中必须选取区域全部事物中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特征加以概括和描述,其所利用的“记述”资料必须反映出最新的科学成就。

2.新的分析和综合方法

有学者通过对区域地理学的新方法进行系统归纳后,总结出新的分析和综合方法至少应包括以下数种:航空摄影、雷达和红外线成像、卫星图像等技术方法,数学方法,空间分析,生态分析,区域综合分析和系统方法等。这些方法是当前区域研究的主要方法^[4],而其中的空间分析、生态分析与区域综合分析是区域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和支撑。

空间分析主要用于研究同一地理现象分布特征及其在不同空间中发生的变异,其程序是:首先,从地图出发,在地图上认真分析地理事物空间分布存在的变异特征;其次,结合自然的和人为的诸因素,探讨造成这种空间变异的原因;再次,结合现实与未来技术的发展,指出实现在区域内合理分布的途径^[4]。生态分析是对人类变量和环境变量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的,主要用于研究一个特定的“均质区域”(homogeneous region)空间内人与环境关系的问题,具体有两种方法:一是在地图或航空相片上分析一个区域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及其地理形态特征,力求明晰各个要素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种方法是研究区域内人地关系变化的历史过程^[4]。由此看来,区域地理学的空间分析与生态分析方法在具体研究实践中是有所侧重的,空间分析主要用于对区域差异的分析,而生态分析则涉及人与地理环境的生态系统,其研究侧重于人地关系系统。区域地理学主要就是研究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两大系统的结构与相互作用的,二者结合在一起就是人地关系的区域系统。因此,生态分析研究在区域地理学中是不可或缺的。

近年在方兴未艾的中原学研究中已有学者敏锐地指出,解决中原学人地关系的基本问题,应该成为中原学学科体系建设的一部分。张新斌先生在《中原学探论》一文中认为,中原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人群兴起的原因、文明的演进、聚落发展的规律和人地关系及可持续发展等都属于中原学关注的基本议题^[2]。张先生明确将“生态研究”“人地关系与可持续发展”列为中原学建设中应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对于用生态分析的方法解决中原学中的人地关系问题,本文暂不拟讨论,但要强调说明的是作为区域地理学重要研究方法的区域(或空间)分析法与生态分析法对于阐释和说明中原地区的区域价值以及中原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毫无疑问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区域分析与生态分析对中原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应是不可或缺的区域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这两种研究方法之最大价值在于能够完成中原学与地理学核心问题的结合,在未来中原学的研究中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

从研究内容上来看,中原学研究内容分为古、今、人、文四大基本领域^[1]。在这四大研究领域之中,除了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以外,中原学还要涉及古代中原地位阐释与古代中原文化的研究,而在中原学有关历史地位问题的研究中,区域历史地理学及其历史区域分析应是中原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与方法。区域历史地理学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某一特定地区内的环境特征、区域差异、区域与区域的关系、人类活动干预对其发展的影响及其变化规律等问题的地理学分支学科^[6]。区域历史地理学以历史区域分析法为主要分析方法,其关注对象在于人地关系、区域分异和区际联系。它与区域地理学有类似的研究对象,即关注重点都在于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研究时段的前、后差异,但二者又能够形成良好的时间延续和空间互补,共同构成地理学在不同时空内研究对象的重要内容^[5]。历史区域分析法引入古代中原及其历史文化的研究,对中原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应是一项颇有价值的学术探索。

三、中原学与历史区域分析法:古代中原与周边区域的差异性比较

“中原”的范围有狭义和广义之别。狭义的“中原”仅指现在的河南省,而“中原”广义上主要是指黄河中下游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广大地区。而就“中原学”而言,李庚香先生特别指出“中原”的地理范围主要指狭义上的中原(即河南),其原因在于只有河南全境都处于中原文化圈之内,能够代表中原和中原文化^[7]。当然“中原学”也不仅限于河南,要包括广义上的中原其他地区^[1]。无论区域空间的广、狭,单就中原学的地域范围而言,我们研究的中原区域在今天可以被划为中国当代15个地域文化区之一。

有学者在阐述中国地域文化分布格局的演变历史,分析各个地域在文化上的地理特征之后,进一步指出当代中国15个地域文化区,其中黄河流域有青藏文化区、草原文化区、秦晋文化区、中原文化区、齐鲁文化区、燕赵文化区,长江流域也有巴蜀文化区、荆楚文化区、两淮文化区、吴越文化区,珠江流域有岭南文化区和云贵文化区,其他还有闽台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西域文化区等。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中国当代的这15种地域文化与文化空间都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因为各地区人群的生产方式、社会风俗、心理特征、民族传统和社会组织形态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形成了区域特征鲜明、多元并存的地域文化格局^[8]。自然环境是造成区域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明确的是“区域”既是地理学研究的目标,同时其又可作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区域地理学的理论要求从具体研究最终上升到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地球表层系统,并进一步探讨其发展变化中的规律。而在这一理论前提下的区域分析方法必须通过研究具体的地理区域来获得地理变化的总体规律。因为个体是整体中的个体,整体是个体集合基础上的整体。地球表层系统就是由无数个具体的“区域地理系统”所组成的,因而地理变化整体规律的归纳必须首先对具体的区域地理进行基础研究,再对多个区域研究的结果进行归纳总结得出。这正如我们通过对中国地域文化分布总体格局的研究,获得了中国地域文化根据其地理环境与演变历史的差异可以划分为15个地域文化区的认识。而中原文化是中国当代15个区域文化之一。对于区域差异的总

体考察是区域分析研究法的第一步和基础。另一方面,任何区域都具有完整的特异性。这里所说的完整性,在地理学上又称作统一性,即指从某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的角度来观察,该区域应成为一完整的地理单元,这一完整的地理单元与其他区域之间相比较具有区域的差异性,这种区域的差异性建立在区域的内在性质上。

区域分析法要求我们既不能忽视地理组合体和地理体系的存在,也要考虑区域是具有完整特异性的区域,两者必须兼顾。事实上,地理区域的特异性只是相对于地理体系总体或者相邻的其他区域而言,这种特异性并不是要割裂区域与总体或其他区域之间的联系。任何一种地理景观的存在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只有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体系内,明确了它在体系中的位置,才能理解它的特异性。当然,要全面弄清一个区域的特异性,不仅要把它放在地理体系总体中去观察,还必须掌握它与毗邻区域之间的空间联系。这两方面的要求就决定了区域地理研究的核心内容:(1)区域内的各种地理景观及其内在实质(包括其中的因果关系)的观察、分析,即区域的个性研究;(2)区域在体系中的位置及其与其他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亦即对空间组合与空间联系的研究^[9]。我们以此分析方法才能从地理学的角度科学地阐释古代中原与其周边区域的区域差异,从而正确认识古代中原在国史上的核心地位。

中原及其文化虽与燕赵、秦晋、齐鲁、荆楚、巴蜀、两淮、吴越、闽台、岭南、云贵、关东、草原、西域、青藏等区域及其文化同属地域性文化,但与周边区域及文化相比,中原及其文化的特异性,即与其他区域及其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是十分显著的。这一特异性虽根植于区域本身,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却是完全不同的。从区域差异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区域性内容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疆域辽阔,各地区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先后、快慢之差,道路有曲、直之别,发展水平有高、低之异,这实际上就表明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人们习惯性认为的是一条单线演进的轨迹,而是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脉络——不同区域在历史发展的起点、走向与经过的阶段等方面都有可能存在根本性的差别,即它们的发展道路不是同一条道路上的曲折或分歧,而是根本不同的,即存在着“历史道路的区域差异”^[10]。而就中原地区而言,可以肯定地说,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于金元以前,中原地区长期都处于历史舞台的中央,这一核心区域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引领中国历史发展潮流的重大作用,其核心地位与价值使这一地区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周边其他地区。

中国文化的肇始从考古学上观察始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起,经由中石器时代延续发展下来的^[11]。在此期间东亚大陆上形成了若干个区域文化,这些文化区域奠定了中国远古文化的基本格局,这些区域文化受到强烈的不平衡规律支配,就存在着发展速度的快慢、水平的高低之分,发展呈现出平衡状况。佟柱臣先生将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七个中心区:黄河流域有马家窑文化系统、半坡文化系统、庙底沟文化系统和大汶口文化系统,长江流域有河姆渡文化系统、马家浜文化系统、屈家岭文化系统。这些文化系统中心是后来各地部族文化产生的历史条件,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面貌的主要反映^[11]。后来,严文明先生也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做了区分,他划分出中原、山东、燕辽、甘青、江浙、长江中游六大文化区。这一区域划分与佟先生所划分的七大文化区在地域上有的重合、有的相异,严文明先生划分的中原文化区实际上包括佟先生所称的豫西、晋南的庙底沟文化系统中心和渭河流域的半坡文化系统中心。所不同的是,严文明先生另将辽河与大凌河流域发展起来的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进行区分,做了一个独立的文化区。佟、严二位先生的文化区划虽有细微的差异,但总的区域原则与数量变化不大。

新石器时代的区域文化奠定了后来中国区域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走向。如果从整体上来考察新石器时代中国境内的区域文化的总体特征,我们就会得出以下两点重要的认识:首先,各个区域文化系统都有自己的内涵和个性,相互之间是不能拼合的,相邻的文化系统之间虽会看到相互影响的痕迹,但它们还是完

全不同的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其次,各文化系统都有自己明确的分布区域,一个地域内往往只存在一个文化系统,并不会同时存在其他文化系统,因而可以说文化系统的中心就是居住在这个中心的部族文化的反映,亦即居住在该地域内某一部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因此,佟柱臣先生强调指出:中国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中经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发展是连续不间断的。这种连续发展是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广泛开展的,因而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经过长期的孕育,在一些“各自具备特点”的地区就形成了多个文化系统中心。这些文化系统中心是前一阶段若干部族文化连续发展的结果。所以说,多中心并行发展既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实际,也是当时文化发展的规律^[1]。在这里,佟先生所说的“具有各自特点的若干文化系统中心”实际上就是不同的地理环境条件下所形成的不同特点的区域文化,正是不同地域背景下连续发展的若干部族创造的文化系统,在以后的历史演进中才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点恐怕不能否认。我们之所以要对新石器时代中国境内的区域考古学文化进行全面的考察,目的就是要从总体上综合地研究这一时期内各区域内文化的起源、分布与演变的地域发展规律,在比较的基础上对不同地域背景下所孕育生长的不同的地域文化及发展特点从空间上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总体的认识,这一要求是历史区域分析法的基本内容。

但对历史区域的分析仅有总体考察还远远不够,因为总体离不开个体,地理变化的总体规律必须通过具体的地理区域才可以表现出来。只有把一个区域放在地理系统的总体中去考察才能进一步深入阐释该区域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差异性,而对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即个性、区域在地理体系中的位置及其与相邻区域之间的空间关系的研究才是阐释证明该区域价值最有力的证据。

严文明先生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的分布格局比作“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分为多个不同的层次。其中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可以看作第一个层次,而其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层次,处于最外层的其他地区,如闽台的昙石山文化和大坵坑文化、岭南的石峡文化以及云南宾川白羊村、西藏昌都卡若、黑龙江新开流和昂昂溪、内蒙古至新疆等地区广泛分布的细石器文化等,可以算作第三层次。这三个层次就像一个巨大的花朵,其中第一层次的中原文化区是花心,第二层次的五个文化区是花瓣,第三层次的文化则相当于呵护、映衬花朵的绿叶。各个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但相互之间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第二、三层次的文化都围绕在中原文化区的周围,中原文化区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核心^[1]。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的分布特征表明中国史前文化格局是一种具有多层次的向心结构,文明的起源与国家的形成最先发生在中原地区,之后是周边的第二层次文化区,第三层即最边缘的各文化区进入文明的时间最晚^[1]。同其他区域相比较,中原地区引领了当时文化发展的潮流,走在了其他区域的前列,这一区域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处在当时诸多文化区域的核心地位。

中原地区与其他区域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文化互动。几十年来的史前考古使我们认识到两个问题:一方面,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发展出的一种饰回旋勾连纹或花瓣纹的彩陶盆不仅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广泛存在,而且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期的文化遗存中也发现过同类产品;另一方面,山东大汶口文化中产生的背水壶、汉江地区屈家岭文化中形成的蛋壳彩陶杯等也曾在中原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过。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中上古时期各部落集团相互之间的人口迁徙、经济交往乃至战争的记述是相呼应的^[1]。若我们将中国新石器时代各文化区内的生产力水平加以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这些区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各个区域生产力发展水平并不一致,其中中原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毫无疑问是水平最高的,这一点可以从铜器的使用上说明。佟柱臣先生在比较新石器时代诸多文化区域生产力发展水平之后强调指出:在当时各个文化区中,发展最快、水平最高的依然是位于豫西、晋南的庙底沟文化系统,该文化系统中属于王湾三期的许多遗址中就发现了铜器。譬如在登封王城岗的灰坑中就已发现了残铜片,在郑州董砦出土的指甲大小的方铜片,牛砦也发现了冶炼铜器的迹象。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中原地区在王湾三期已经出现

了人工冶炼铜器,生产力有了新的提高。就当时各地区文化发展水平比较而言,居前三位的依次是二里头文化、良渚文化和石峡文化,而半山类型、马厂类型、石棚山类型、于家村遗址等均居于末位,这些类型尚处于绚丽多彩的彩陶文化阶段,与二里头文化所达到的青铜文化阶段,显然相差一截^[11]。二里头文化在时间上与古史中所记载的夏代纪年(公元前21—前16世纪)大体吻合,基本上可以视为夏文化的代表,因此二里头文化也被认为是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主要对象,中原地区二里头时代的文明成果为商、周所继承,使得中原地区成为夏、商、周早期国家诞生和发展之地,其核心区域之地位远非其他区域所能及。

总之,在中国早期国家与中华民族的起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中原地区发挥过核心作用,其历史作用与地位非周边区域可比。我们把中原学与地理学,特别是区域历史地理学相联系,不仅有助于构建中原学的学科体系,而且还可以深入阐释中原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价值,这对于深化中原学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 [1]李庚香.打造“中原学”一流学科,奋力建设思想河南:从中原发展哲学的视角考察[J].河南社会科学,2016(6):1-16.
- [2]张新斌.中原学探论[J].河南社会科学2017(10):120-124.
- [3]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
- [4]李剑波.试论地理学的核心:区域地理学[J].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8(2):94-100.
- [5]熊梅.地理学区域研究与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取向[J].地理科学进展,2013(8):127-135.
- [6]孙进己.东北亚研究: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 [7]李庚香.中原文化精神:上[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
- [8]李慕寒,沈守兵.试论中国地域文化的地理特征[J].人文地理,1996(1):7-9.
- [9]鲁西奇.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6):83-90.
- [10]鲁西奇.中国历史发展的五条区域性道路[J].学术月刊,2011(2):120-125.
- [11]李伯谦,陈星灿.中国考古学经典精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作者简介:陈隆文,男,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

(摘自:《河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